

歷代少數民族詩詞選

(上)

87
I222
135
3:1

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
上

庄星华 选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呼和浩特



B

332391

历代少数民族诗曲选（上）

庄 星 华 选 注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土左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50 千 插页：3

1985年10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统一书号：16020·311 每册：3.10 元

凡 例

- 一、 本书编选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有代表性的诗作，主要为诗、词、曲三种诗体，故定名《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
 - 二、 本书所收只包括中国少数民族用汉文写的诗歌和虽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但早已译成汉文者，不包括用少数民族文字写的诗歌。
 - 三、 凡中国境内历史上存在过的少数民族，其诗歌均在入选之列。
 - 四、 在民族交往的历史中，融入少数民族的汉族，据查其生活习惯已具少数民族特点者，则列入少数民族。这样便于认识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亲密关系。
 - 五、 外国人用汉文写的诗歌均不收入，如朝鲜、日本、越南诗人的作品。
 - 六、 但外国人之移居中国者，其作品在入选之列，象越南陈芹因逃交南黎氏之乱来中国定居，在南京结社赋诗，其作品即属此类。
-

前 言

我国国内各民族，自古以来就共同生息在中国这块广阔、富饶的土地上，并且在这里创造了灿烂夺目的古代文化。

本书编选的目的就是想从诗歌方面，探索一下各少数民族对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贡献。这对正确理解国内各民族自古以来在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生活各方面的紧密关系，增强民族团结，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产生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因为，主体民族形成后，才产生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产生了，才有少数民族诗歌。

汉民族的形成应当始于秦汉，早在1954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就提出这个正确论断。我们知道，斯大林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无疑，秦汉时汉民族已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就是证明。马克思说：“在民族制度下，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而中国这种形式的政府（中央集权的国家）正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所以它成了汉民族形成的摇篮。这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范文澜同志的论断：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是十分正确的，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的。而在研究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搜集到的少数民族诗歌，最早的也产生于汉代，象西汉时期的《匈奴歌》、东汉时期的《杂都夷歌》，这恰好反映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

二、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分期

文学现象的历史分期有它自身的规律，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和文学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因素而定。少数民族文学的分期，除照顾上述两个因素以外，还要照顾到第三个因素——即民族的因素。这样，才能突出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特点。而对这种文学现象，目前国内学者还很少涉足。

我国历史上有着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不断有少数民族借入主中原的机会，融合到祖国民族大家庭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吸收了汉文化，并且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才华，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那么，这几次大的民族融合，这些新汇入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文学活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应当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分期的重要标志。

根据这样的原则，似乎应将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划分这么三个时期，即：

第一个时期，自汉至唐宋（约从公元前三世纪末到公元十三世纪）。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滥觞于汉，发展于南北朝，盛于唐，而以宋为其尾声。这一时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匈奴族和鲜卑族。

第二时期为辽、金、元、明（约从公元十世纪到公元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北方少数民族接连建立强大政权和懦弱

的宋王朝相对峙,直至元统一中国为止。这一时期的辽、金少数民族文学,与宋代的少数民族文学在时间上是相重合的。但从民族的角度考虑,将辽、金少数民族文学算作这时期的开始,而将宋列为上一时期的尾声。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诗坛上的少数民族先后为契丹族、女真族和蒙古族。

第三时期为清(公元1664—1911)。这时期女真族的分支——建州女真(即后来的满族)在东北建立起强大的政权,然后入主中原,因而为以满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带来空前繁荣的局面。如果说清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总结,那么清代少数民族诗歌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终结和总结。

下面试逐一论述之。

第一个时期首先登上诗坛的是匈奴族,而在诗歌创作上贡献卓著的是鲜卑族。匈奴族自称“天之骄子”,素以强悍闻名。在汉王朝建立之初,他们曾给这个中央政权带来极大威胁。但当汉王朝休养生息,强大起来以后,形势发生了逆转。最后其主力在汉朝强大的武装力量连续侵伐下,不得不远遁欧洲,其留下部分则融合于祖国民族大家庭之中。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南北朝时有刘勰的《述怀诗》百余篇(惜已佚),其后尚则有唐时的著名诗文学家独孤及。

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遭遇,比匈奴族要幸运得多。他们兵临长城的时候,正值中原混乱之机,因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主中原,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为鲜卑族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特别是经过北魏孝文帝的励志改革,更为这种发展廓清了道路。其后的孝庄帝元子攸、节闵帝元恭以及帝室贵胄元颢、元晖业等都是能文之士,留下一些富有新意的诗篇。在北魏皇室的影响下,继北魏兴起的鲜卑族宇文部北周政权,也颇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象北周明帝宇文毓,以及宗室宇文招、宇文迪,还有嫁给突厥可汗的宇文公主等,在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可喜成就。

经过鲜卑人数十年的努力,到唐代时,他们的诗歌创作放射

出夺目的光彩。象唐初位居开国功臣之首的长孙无忌和他的妹妹太宗文德皇后，不仅在辅佐唐太宗建立强大国家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显示了出众的才华。还有唐朝的著名诗人元结、元稹，更是朝卑族后裔诗人以及中国古代诗人中的佼佼者，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唐朝末年，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这就是五代十国时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但这个时期历史较短，只有半个世纪（公元907—960），且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极为迅速，最长的朝代不过十几年，最短的朝代仅三年多一点时间，而文学的发展却是需要长期的孕育和平静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做基础的。所以，这个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少数民族，除唐庄宗李存勖（沙陀人）和较熟的政客、三朝元老郭存义（沙陀人）留有少量作品外，很少出现其它的诗人和诗作。而到宋代，鲜卑族后裔万俟咏却独冠一时，即置诸汉族词人中也属出类拔萃者。不过，这总还是凤毛麟角，所以参予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少数民族的诗歌作品在诗歌创作上还不能构成独立的分期。

探索汉至宋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繁荣的原因，首先应归功于北魏鲜卑皇室采取的开明的、有步骤、有计划的民族融合政策，如奖励汉学，采用汉姓等。特别在改姓方面做得颇有条理，井然有序，如以沙莫雄为皇枝之长，改为长孙氏；以帝拓拔氏改为元氏；献帝兄侯氏改为万俟氏等等——当然这种作法也是接受汉族影响，和当时的重视门弟的风尚是分不开的——这样就为我们研究鲜卑族后裔的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

其次，应归功于唐太宗的雄才大略和博大胸襟。唐太宗在人才使用方面是以“不拘一格”著称于世的，他的著名的文臣武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政治集团，甚至来自敌对阵营，而他均能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在民族问题上，他也做得较为持平，因而有唐一代各少数民族出身的文臣武将层出不穷，这一点，在我国古代

任何时期也是不能比拟的。这就保证了唐王朝时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经济地位，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并构成唐代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过去，我们在研究唐代文学时，往往注意其高度发展的繁荣景象，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

第二个时期，由于宋朝的腐败，在北方相继出现了三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即辽、金、元，与此相应的是这一时期活跃于中国诗坛上的少数民族则先后为契丹、女真、蒙古诸族以及色目人（即西域诸民族）。

契丹族和女真族均极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辽代的皇帝后妃如：圣宗耶律隆绪、道宗耶律弘基，以及道宗后萧观音、天祚帝妃萧瑟瑟等，都写了一些清新可喜的诗篇。值得称道的是，辽东丹王耶律倍，可说是契丹族吸收汉文化的先行者。他自己留下的诗篇虽不多，对汉文化的发展光大却贡献卓著。他于医巫闾山（在今辽宁）藏书至万卷，并且精于书画，《大宋宣和画谱》就载有他的画近十幅。在他的影响下，其后裔耶律能诗善文，官至金朝宰相，而耶律履之子耶律楚材更是元朝的开国功臣和元初的著名文士。

女真人的诗作大体和契丹人走着相同的路子。其皇室中如金章宗完颜璟的诗作，颇为精巧绮靡，密国公完颜璋更是金末文坛的领袖人物。可惜辽、金两代文禁甚严，严禁其文传入中原，致使很多诗文白白佚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无法补救的憾事。

元朝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政权，为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诗歌创作是元好问、耶律楚材首倡于前，马祖常、贯云石接踵而起，其后萨都剌、迺贤纵情咏唱，形成一代诗文繁盛的局面。这些少数民族诗歌大家，其作品与同时代的汉族诗人象虞集、揭傒斯、杨维禎等相比，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但是，这种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繁荣景象到明代却突然消沉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和元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繁荣形成明显的对比。究其原因，首先是明朝统治者缺乏远见卓识和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明太祖朱元璋虽也曾表示：“蒙古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体擢用。”但这显然不是由衷之言，故很难在实际中去兑现。由于元朝建立之初在战斗中，避免不了对宋家兵卒的大量杀戮，加之，在民族间发生战争时，军民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因而这种杀戮总是扩大化的；以及其后元朝官吏的横征暴敛，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因而当明朝兴起之际又出现了大量屠杀蒙古等少数民族人民的悲剧。如元末著名诗人丁鹤年（西域回回族）就畏祸迁徙无常，甚至母死不能奔丧。蒙古族后裔蒲松龄的祖先在明初竟至只余一寄养于外祖杨姓家中的遗孤，而该遗孤亦被迫一度以杨为姓，到后来才恢复蒲姓。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元王朝的退居漠北，大批蒙古人，色目人改为汉姓便是必然的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曾言：“今代山东氏族（指中原一带世家大族——引者注），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他的话是符合历史实情的。但是由于改用汉姓，这些金元后裔今天我们便很难考证了。

其次，明代对少数民族的赐姓缺乏统一规划，致使与汉族姓氏混淆，几代以后不易识别。据《日知录》记载：明洪武时以火你赤为翰林蒙古编修，更其姓名为霍庄，遂使其姓与汉族霍姓相混。其它如观音保赐姓名李观，丑阿赐姓名李贤，把都帖木儿赐姓名吴允诚，编都尔灰赐姓名柴秉诚等，均属此类。这与北魏孝文帝谱系分明的改姓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基于这种种原因，所以说明代一定有很多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及其诗作在混乱的历史进程中被淹没了，这是很可惜的。

第三个时期随着满族入主中原，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他们以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文坛上的活跃势力。其次则为蒙古族诗人。至于新疆一带少数民族，由于沙俄的入侵及其唆使

噶尔丹不断发动反清叛乱，因而很少有人登上诗坛。即使如此，这一时期出现的满、蒙等少数民族作家和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年代。纳兰性德、佟世南的词作，起明词之衰，成为清词的双璧，代表了清代词学的最高成就。纳兰性德诗作的成就虽不如词，蒙古族后裔蒲松龄诗作的成就虽不如其著名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但也不乏有特色、有个性的篇章。

以上分期主要是依据北方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活动划分的。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处于祖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和高山峻岭阻隔，西南少数民族从来没有取得过全国政权，因而他们的文学活动也缺乏全国性的影响。所以，西南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只好附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诗作分期之中。

西南少数民族诗作大致有这么几个光辉的发展片段：一、唐南诏国时期：这是唐时建立在云南一带的乌蛮、白蛮少数民族地方政权，自其国王阁罗凤任命汉人郑回为宰相后，认真吸收汉文化，因而在其君臣中出现一些能用汉文创作的诗文之士。二、元代大理国时期：这一时期可看作南诏国文化的继承和折光，其代表作品是国王段宗兄妹感伤家庭遭遇及元末政治倾轧的诗篇。三、明代以贵州水东宋氏、水西安氏以及云南丽江木氏等世袭土司为代表的诗作。明代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策略是颇为成功的。明太祖朱元璋惩治了一些欺压西南少数民族的不法官吏，并在一定程度上尊重西南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而使西南地区出现了一时的安定局面，为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这种暂时的安定局面到清代被破坏了。清急于“改土归流”——即废除落后的土司世袭制度，而逐步以中原地区的官员流徙调迁制度代替之——这种措施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由于清代政治的腐败，贪官污吏借丈量土地之机大肆勒索，因而激起西南地区人民不断的反抗。于是明代在西南局部地区出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萌芽被扼杀了。

以上分期情况是相当简略的。据现有材料，我们只能知道中国各民族融合的大致情况，以及少数民族融入祖国民族大家庭中之后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般概况，至于其全貌我们是一时难以说清的。这是因为民族血缘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很难准确地弄清其详情。即使是北魏孝文帝制订了有条理的改姓制度，也只能为我们研究鲜卑后裔提供一定的方便，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历代王朝盛行的赐姓制度就是给民族姓氏带来混乱的原因之一。如汉代匈奴人被赐姓刘氏，以及北魏、北周时汉族官员获得鲜卑姓氏等等。如果我们简单地以姓氏区分诗人的民族成份，那反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八代诗选》中，选有宇文昶的作品，但这“宇文”竟是汉人赵昶的鲜卑赐姓。所以，在以姓氏区分少数民族诗人的同时，还必须辅之以必要的考证。

三、少数民族对中国汉族古典 诗歌发展的贡献

这是一个内容浩瀚的题目，涉及到古典诗歌的思想、艺术、流派以及诗体的演变等各个方面，这里只能摘其主要者略述一二。

一、丰富了中国汉族古典诗歌的艺术宝库，推动了中国汉族古典诗歌的发展。

各少数民族加入我国民族大家庭之后，绝不仅是被动地接受汉文化，成为汉文化的单纯吸收者；他们还能主动地参予汉文化的开拓和繁荣工作，成为汉文化发展中的积极的推动者。

还在少数民族诗歌处于民歌时代，他们的创作就以其特有的色彩闪耀于中国诗坛。如其代表作即著名的《敕勒歌》，一反南朝民歌的缠绵柔媚，而以雄浑的气势响彻中国大地，成为千古绝

唱。它不仅是北朝民歌的光辉代表，也是整个南北朝诗歌的高峰。

这种奇异的闪光到少数民族诗人大量涌现以后，就显得更加绚丽多彩了。在唐代诗坛群星灿烂的时代，鲜卑族后裔元稹显示出卓越的才华，他和白居易一起成为著名的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实践者，人们习惯地把他们并称为“元白”。元稹的诗歌创作成就虽稍逊于白居易，但却最早提出了新乐府创作的理论。另外，他的自传体小说《莺莺传》在我国古典小说创作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唐代另一位鲜卑族后裔诗人元结则在诗歌的人民性上矗起了一块丰碑。他的著名诗篇象《春陵行》、《贼退示官吏》等，在揭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为人民的不幸呐喊方面甚至超过了杜甫。杜甫也赞许地称颂道：“观乎春陵作，歎（Xǐ）见俊哲情。复覓贼退篇，结也实国桢。”（《同元使君“春陵行”》）只是他的作品在艺术性上不太考究，因而未能发挥像杜甫那样的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波斯人后裔李珣成为花间词派的重要词人，对新的诗体——词的开拓有重要贡献。北宋时，鲜卑族后裔万俟咏曾充大晟府制撰，奉命按月律进词，对词律的订正、新词的创制颇多建树，人称为“元祐诗赋科老手”（王灼《碧鸡漫志》）。

金元时，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在当时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当时北中国战乱频繁，唐宋以来辛勤积累的文化典籍迭遭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鲜卑族后裔诗人元好问以其出众的才华独步中国文坛达三十年，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到了存亡继绝作用。难怪沈德潜称他为：“东坡后一能手。”（《说诗晬语》）赵翼甚至称他的诗：“虽苏（东坡）、陆（游）亦不及也……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元好问）则往往有之。”（《曝北诗话》）足见后人对他的诗作的重视。

萨都剌是元代才华横溢的少数民族诗人。他的绮靡的宫词在元代就负盛名。而他更突出的贡献则是那些揭露社会黑暗、同情

人民疾苦的诗篇，象《征妇怨》、《百禽歌》等等。有时他甚至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元代最高统治者，写下了《记事》、《鬻女谣》等杰作，这是难能可贵的。在词作方面，萨都剌也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和《念奴娇·石头城怀古用东坡赤壁韵》被选入《白香词谱》，成为后人填词的楷模。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被誉为“古今绝唱”，后代几无人敢与之比肩，而萨都剌就有这样的才华气质，不仅敢与之唱和，而和词之工堪与原词并称双美。

元代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也是很有特点的。他的《君山行》写洞庭湖之游，如梦如醉，扑朔迷离，夸张地写出洞庭湖的浩瀚气势；他的《观日行》对日出的描绘，想象奇特，色彩浓艳；这样的作品是对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直接继承。而他的曲如《清江引》：“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明白如话，情思缠绵，把它放在元曲小令的优秀行列中是当之无愧的。

清代少数民族诗人中成绩卓著者当推纳兰性德、佟世南和蒲松龄。纳兰性德和佟世南的词虽然生活视野不够广阔，免不了贵族之脂粉气和伤感情绪，但终究代表了清词的最高成就。特别是纳兰性德出使东北以及奉命视察索伦部（今苏联境内外兴安岭一带）之作，更是苍凉悲壮、情切语工，是诗词中不可多得的佳品。蒲松龄则以他的独特经历，写出不少同情农民疾苦的诗篇，像“此时晴雨关生死，非比寻常家报传”（《喜闻雨信》）这样的诗句，而这样的诗作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是不多见的。

二、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范围和生活视野。

每个诗人都以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吟咏着他所生活的时代。少数民族加入祖国民族大家庭后，他们的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感受，顽强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从而使他

们的诗歌带有其本民族的生活烙印。这样的诗歌绝不是久居中原的汉族诗人能够创作出来的。这方面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像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和“救旱河为雨，无衣裘种羊”等对当时西域风光的描述，金章宗完颜璟的《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发一枝”，对金上京（在今黑龙江阿城南）风物的描绘，都扩大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范围。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民族诗人有这种独特的经历，中原的诗人是无法获得这种感受的。

还有少数民族诗人以其特殊身份参予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是中原诗人难以反映的。象清代著名诗人纳兰性德奉命与副都统郎谈率兵视察苦于沙俄侵扰的索伦部情况，为后来的反击沙俄侵略作准备。这次出巡，诗人为我们留下了《浣溪沙·小兀喇》、《青玉案·宿乌龙江》和《浣龙与经温叔夜话》等珍贵诗篇，展示富饶美丽的东北原野的生活画面。还有，纳兰性德的弟弟揆叙，曾随康熙远征克鲁伦河（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他写的《度克鲁伦河》一诗，就记载了这次重大事件，充满豪情地吟咏了对新到噶尔丹策凌在沙俄唆使下发动的叛乱的征讨，赞颂了这个伟大的、影响深远的历史性胜利。满族人全魁虽称不起著名诗人，但在乾隆丙子年（公元1756年），他曾奉使册封琉球国王，这次出使他写下了《自南台（在福州南闽江中）登舟泛海抵中山（即琉球，明时曾册封其国为中山）即事》诗，描叙了海上风光，从而扩大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活视野。

三、保护中原文化传统，整理古代诗文典籍。

少数民族诗人对汉文化的贡献还表现在保护中原文化传统，整理古代汉族诗文典籍方面。当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初，中原大地上往往会出现严重的破坏和杀戮，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民族关系逐渐转变为和睦相处。北魏时期孝文帝奉行的融合政策便是其

中典型的代表。据《北史》记载：延兴十八年，孝文帝“诏寿阳、钟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口皆放还南。”十九年北魏“军士擒齐人三千，帝曰：‘在君为君，其人何罪？’于是免归。”改变了过去那种残杀战俘和使俘获百姓沦为奴隶的消极措施。

在少数民族逐鹿中原的混乱之时，有的少数民族诗人还直接起到抵制民族间相互残杀的作用。这方面突出的代表要算耶律楚材。他虽然出身于契丹贵族，但由于他个人的才华，先后得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特殊赏识，官拜宰相之职，在元初政治建设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当元伐金，金都汴京沦陷时，耶律楚材又及时建议废除屠城旧制，使金都汴京在战火后得保一线生机。金亡，亡金故官被拘至山东聊城，著名诗人元好问沦为俘虏，也幸亏耶律楚材等人的保护才得以免于难。从中可以看出少数民族诗人在民族战乱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当少数民族定鼎中原，建立起巩固的中央政权后，少数民族诗人对中国汉族古典诗歌发展的贡献，除积极从事诗歌创作外，则表现在对汉族诗歌典籍的整理方面。突出的如元好问编订的《中州集》，对保存有金一代诗歌起了巨大的作用。清时的铁保编订的《熙朝雅颂集》对保存、整理满、蒙旗人的诗作有重大贡献。清代的女诗人弹珠编订的《清闺秀正始集》在保存清代妇女诗作方面建立了特殊功绩。所有这些构成了少数民族诗人对中国汉族古典诗歌发展所作贡献的一个重要侧面。

以上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贡献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学者涉足者还甚少，加之本人才疏学浅，积累不丰，要完善地论述这个问题自感力所不及，因此，错误之处，势所难免。好在本书只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当之处，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编 汉南北朝唐五代宋诗词选

佚 名	匈奴歌	(1)
唐 戴	作都夷歌	(2)
	远夷乐德歌	(2)
	远夷慕德歌	(2)
	远夷怀德歌	(3)
苻 朗	临终诗	(4)
佚 名	敕勒歌	(6)
	阿那瓌	(6)
	折杨柳歌辞 (二首)	(7)
元 颢	应制赋铜鞮山松	(8)
元子攸	临终诗	(9)
元 恭	诗一首	(10)
元晖业	感遇诗	(11)
宇文毓	赠韦居士瓌	(12)
	过旧宫	(13)
	和王褒咏摘花	(14)
宇文招	从军行	(15)
宇文道	至渭源	(16)